

黔东革命根据地史论

中共铜仁地委党史研究室组编

唐承德 撰稿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东革命根据地史论

中共铜仁地委党史研究室组编

唐承德 撰稿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吴家萃

封面设计 江帆

版式设计 夏顺利

黔东革命根据地史论

中共铜仁地委党史研究室组编

唐承德 撰稿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 550001)

*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125 印张 146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221-04761-8/K·421

定价:13.00 元

序

肖永安

黔东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云贵高原上建立起来的一块红色苏区，是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即红二军团）与黔东南各族人民浴血奋战打下的一片人民江山，是全国革命根据地中的一颗灿烂的明星。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展了武装斗争，进行了土地革命，改变了千百年来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土地归农民所有，人民当家做了主人。黔东南苏维埃政权成为贵州解放后人民政权的雏形，给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红三军从此由挫折走向胜利，迎来了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的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实现了红二、六军团在印江县木黄的胜利会师，从而使红军得到发展、壮大，孕育了红二方面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片闪耀历史光辉的土地上，红军与苏区各族人民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团结战斗，不怕牺牲，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革命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和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片充满希望的革命老区，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有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有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有改变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一定能够早日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再立新功，再创辉煌。

鉴于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开展对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研究，是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支持。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将此列入1993年全省研究课题，由铜仁地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实施，唐承德同志负责，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完成了该课题的研究任务。专家们认为，这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书稿”。

看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史论》后，使人振奋。书稿有史有论，史论结合，资料丰富、翔实，观点明确，论据充分，结论求实，使人信服，是一部难得的有学术价值的论著。该书稿的出版，值得庆贺，值得推荐。它将为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提供一份了解黔东革命老区历史的史料和建设老区的参考资料，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本好教材。

愿这颗小苗开出精神之花，结出物质之果！

（作者系中共铜仁地委书记）

1996年12月

（作者系中共铜仁地委书记）

（作者系中共铜仁地委书记）

（作者系中共铜仁地委书记）

（作者系中共铜仁地委书记）

（作者系中共铜仁地委书记）

引 言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致使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在这期间，退出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转战于湘鄂川边，数次建立根据地未果。红军受到极大削弱，革命处于最困难时期。黔东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改变了红三军无根据地的局面。同时，为红二、六军团会师黔东创造了条件，为红二方面军的形成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基础，并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全部历史将证明这一历史性功绩。

目 录

序

引言

第一章 红三军与黔东“神兵”的革命联合	1
第一节 红三军入黔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决策	1
第二节 黔东“神兵”斗争	8
第三节 红三军与黔东“神兵”实现革命联合	18
第二章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26
第一节 枫香溪会议的决策	26
第二节 红三军的自身建设	31
第三节 黔东苏区初创时的重大举措	35
第三章 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	39
第一节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39
第二节 中央指示信对红三军和黔东苏区的影响	42
第三节 关于武装斗争的开展与苏区的扩大	50
第四章 苏区的建设及其特点	56
第一节 中共党组织的建设	56
第二节 苏维埃政权建设	67
第三节 关于群众组织	74
第四节 关于土地革命	76
第五节 关于工农武装	84
第六节 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93

第五章 根据地的巩固与反“围剿”斗争	100
第一节 关于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苏区的方针	100
第二节 反“围剿”斗争的部署	105
第三节 反“围剿”斗争的开展	111
第六章 红二、六军团会师黔东苏区	116
第一节 红六军团西征的战略目的	116
第二节 甘溪战斗受挫之原因	121
第三节 红二、六军团会师	129
第七章 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	137
第一节 关于两军团行动的决策	137
第二节 两军团主力东进前的举措	142
第三节 发动湘西攻势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47
第八章 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奋斗	151
第一节 黔东特委的成立和独立师的重建	151
第二节 苏区军民的艰苦奋斗	155
第三节 独立师的撤离与失败	163
第四节 苏区人民前仆后继	168
第九章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73
第一节 根据地创建的历史条件	173
第二节 根据地创建的历史意义	178
第三节 根据地创建的历史经验	181
第十章 黔东根据地是一块独立完整的革命根据地	185
第一节 关于黔东苏区属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范畴的问题	185

第二节	关于黔东苏区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一部分的问题.....	188
第三节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一块独立完整的革命根据地.....	192
第四节	黔东苏区永放光芒.....	195
附	黔东革命根据地大事录.....	201
后 记		215

第 一 章

红三军与黔东“神兵”的革命联合

第一节 红三军入黔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决策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是红三军在贺龙、关向应等带领下，以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理论指导原则，认真总结了创建湘鄂西苏区的丰富实践经验和丧失根据地的痛苦教训，并在与坚持“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人的斗争中，把握敌我态势，审时度势创建起来的。

从1932年10月红三军离开洪湖苏区，转移湘鄂边，到1934年5月进入黔东的一年多时间里，湘鄂西中央分局先后召开了烧巴岩、大村和十字路会议，分别作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决策。但由于敌我力量的变化，由于分局书记夏曦继续搞肃反扩大化，错误地解散了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取消了政治机关，使红三军蒙受了巨大损失，也由于夏曦在军事行动方针上的错误，分局的决议都未能实现。红三军到了黔东，形势才有了转机，有了较好的群众基础，从此开始了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关于大村会议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要追溯到湘鄂西中央分局大村会议。因为这次会议，是分局关于根据地问题在战略决策上有重大转变的一次会议，与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着密切的关系。

1932年10月，洪湖苏区因未能粉碎敌军第四次“围剿”而完全丧失。这年底，红三军撤离洪湖苏区，经长途跋涉，远征7000里，最后到达湘鄂边。贺龙、关向应提出恢复湘鄂边苏区。可是夏曦却认定红三军内部不纯，主张在红三军中举行清党和继续“肃反”。1933年1月开始重新登记、审查红军中的党员。1933年3月，夏曦不顾许多主要负责同志的坚决反对，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同时还取消了红军中的政治机关。从此红三军没有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强制和惩办代替了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军阀主义、家长制度取得了合法地位，部队中的民主生活、自由空气没有了。这一切，严重地打击了指战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损害了部队的革命热情和作战能力，严重地削弱了地方工作与对敌斗争，以致群众不能发动，红军不能扩大，根据地不能巩固和发展。两次反“改组派”先后逮捕了上千人，洪湖苏区创始人之一的段德昌等一大批干部被错误杀害，使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力量遭受严重削弱，红三军由9000多人锐减到3000来人。这场所谓反“改组派”斗争，正如后来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

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场所谓反“改组派”的斗争,直到1934年5月黔东苏区创建时才逐渐停止下来。

1933年7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烧巴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湘鄂边形势和红三军行动,虽然作出了《关于巩固发展湘鄂边新苏区,争取革命和战争胜利的任务的决议》,但是,由于“肃反”、“清党”之后,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受到极大的削弱,也由于夏曦抛弃烧巴岩会议决议,率部外线远途奔袭,分散了红军力量,致使巩固发展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恢复了湘鄂边部分苏区再次丧失。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湘鄂西中央分局又于1933年12月19日在湖北咸丰的大村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苏区,另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并把“恢复湘鄂边苏区”的口号改为“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口号。大村会议作出的这一决定,明确了分局创建新苏区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创建新苏区的任务,把红三军创造新苏区的活动范围,从湘鄂边扩大到湘鄂川黔边广大地区。然而,这一决议迟迟没有实现。其原因,正如分局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指出的:“虽然当时分局提出了创造湘鄂边苏区以至发展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任务,但是实际工作陷于盲动的右倾机会主义,没有坚决执行自己提出的任务。特别是从黔江退出到江垅作战这一时期,完全陷于盲目麻痹的状态。”^①

尽管如此,大村会议的历史功绩在于,它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政治上思想上创造了条件,对红军的发展产生了

① 引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106页。

深远的影响。

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 与十字路会议的决议

湘鄂西中央分局大村会议后，红三军进入四川活动。1933年12月下旬攻占了黔江县城。仅在这里休息一周，就在敌人的反扑时退出黔江，转回咸丰、利川境内活动。1934年1月3日，红三军袭占利川城。随后与敌周旋于鄂川边。接着又进入湘西的龙山、永顺、桑植、大庸、慈利5县境内游击。

在这期间，不仅分局大村会议“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决议未能实现，而且红三军的行动，又陷于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之中，陷入麻痹和消极状态。其历史教训是深刻的。主要有：一是分局主要负责同志指导思想的错误。在红三军攻占黔江后，夏曦企图“于巩固的军事占领”以后才进行开辟新区的工作。因而未能发动群众，开展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二是分局把主要精力放在清党（重新登记、审查党员）工作和对“改组派”的斗争上，放弃了组织发动群众创建新苏区的机遇。三是继续搞第四次“肃反”。在黔江等地，捕杀了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红七师政委盛联均和师长叶光吉，以及其他许多干部。这次“肃反”一直延续到1934年夏天，进一步严重地削弱了红三军的力量。

夏曦忠实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越来越受到贺龙、关向应和卢冬生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吸取一年多来红三军的军事行动在指导方针上的经验教训，加强对红军的集体领导，1934年3月17日，在湖

南慈利县江垭，成立了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天，湘鄂西中央分局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组织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为此一游击区域之苏维埃领导机关，以（夏）曦为革（军）委员会主席。”^①它的成立，在军事和政权领导上，为红三军创造黔东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为了改变红三军的困难处境，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4月14日在湖北利川县十字路举行会议，作出了《关于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任务的决议》，计划创造以小河、活龙坪一带为中心的游击区域，使湖北咸丰、利川、宣恩，四川黔江、石柱等地成为新的游击根据地。

分局十字路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计划在鄂川边发展苏维埃运动，继而扩大到湘鄂川黔边广大地区，以实现大村会议的决策。这无疑是正确的。正如分局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所指出的：“1934年4月十字路会议，中央分局估计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开展与湘鄂川边的群众斗争之开展，所以决定了发展鄂川边区的任务，以鄂川边为游击的中心区来创造新的根据地，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中央分局路线转变的开始。在这个时期，红军中的清党任务也完成了，党的工作已经开始，党在红军中的威信也渐渐提高起来。”^②但是，由于鄂川边，特别是四川敌情的变化，加之分局几位成员在军事行动上意见不一致，因而，

^① 参见《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1934年3月17日），引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32页。

^② 参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一书第108页。

这一决议未能付诸实施。直到红三军进入黔东，分局在枫香溪会议上作出创建黔东根据地的决议才得以实现。可以认为，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和分局十字路会议的决议，是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前提条件和组织保证。

红三军入黔的原因

1934年5月7日，红三军袭占四川彭水县城。5月10日，红三军撤离彭水县城，西渡乌江，开始向黔东转移。

红三军从四川彭水进入黔东的军事行动，历来都有争议。搞清它的真正原因，对于正确评价黔东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红三军入黔原因，到目前为止，史学界有几种说法：一说是夏曦认为彭水背山面水，易攻难守，敌人打来难以应付，于是命令红三军撤出彭水，西渡乌江，向贵州东部游击；一说是夏曦惧怕敌人，一心避战，轻率地抛弃了十字路会议的决议；一说是分局根据川东敌情的变化和彭水的地理条件，审时度势而作出的行动方针。

笔者认为，第三种说法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其依据是历史文献和对当时形势的调查与分析。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十字路中央分局会议的主要意义在于：（一）企图创造游击中心区域成为新根据地；（二）要用大的力量做群众工作；（三）要有目的地游击。在这个会议以后，……才决定发展鄂川边苏维埃运动的任务。但是主力部队还不能在鄂川边屯住，所以又从利川游击到酉阳稍得休息，继续完成了七师的清党任务。在酉阳又受到川军的进逼，所以才突出彭水，

从彭水渡河进贵州。”^①

对于第三种说法所引用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向中央的上述报告,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呢?笔者带着这个问题,先后到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县调查,走访了健在的知情老人,访问了原在军阀刘湘部和地方任职的现政协人士,并查阅了有关敌伪资料,进行了综合考证。其基本情况是:红三军在湘鄂川边活动时期,四川军阀刘湘秉承蒋介石旨意,在重庆召开“四省边区会议”,贵州、湖南、湖北、四川军阀均派代表参加。会上成立了“湘鄂川黔剿共联防总指挥部”,主持对红军的“会剿”。制订了办民团、筑碉堡,强化保甲制,设立联防哨所等一系列对付红军的反动措施。在此次行动中,刘湘特别卖力,在四川成立了民团总指挥部,实现所谓“军团合一”,即军队与民团的合一;在各县成立驻军、地方官僚封建势力相结合的“团务委员会”、“防共指挥部”,还组织了“铲共义勇大队”和“剿共宣传队”等反动组织。刘湘把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划为重点“剿共”、“防共”区,调拨了1万多支枪,集中了地方的“公枪”和“私枪”,建立民团组织,加快“剿赤”步伐。仅酉阳一县,就达8000人枪;黔江整编精壮民丁3600人,在县境内部署了几道防线;在秀山南门外修建飞机场,准备从空中支援。妄图给红军造成一个“步步荆棘,束手待毙”的局面,同时,刘湘派遣第五师达凤岗旅进驻涪陵、彭水,田冠五独立第五旅负责酉阳、秀山防务,周化臣部和达凤岗旅三十七团扼守黔江。综上所述,由于川东敌人力量的加强,给红三军在这一地区活动带来了极大困难。

^① 引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145、146页。

在红三军方面，贺龙在十字路会议召开前，对于在鄂川边发展苏维埃运动早有打算。在他的积极建议下，促成分局在十字路会议上作出了决议。他在十字路会议后，想充分利用“老关系”、“反动势力薄弱”、“物资也较丰富”、“贫雇农多”以及“山大”等等有利条件，在酉秀黔彭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一计划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上的，是正确的。

但是，由于形势急剧的变化，敌人在川东的力量加强，红三军在酉阳县境内遭到川军的进逼。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其有利条件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红三军继续在酉秀黔彭活动，即或是建立了根据地，不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也不容易巩固。夏曦作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和湘鄂川黔军委会主席，在红三军袭占彭水后，对上述情况以及彭水县城的地理条件当有所了解。因此，我们认为，敌人在川东力量的加强引起的形势的急剧变化，加之红三军在酉阳县境内遭到川军的进逼，是红三军进军贵州的主要原因；彭水县城的地理条件则是红三军撤离彭水的直接原因。

红三军入黔，和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具有客观的必然性的，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节 黔东“神兵”斗争

红三军在湘鄂边游击期间，黔东“神兵”斗争如火如荼。黔东“神兵”为反对苛捐杂税而起，矛头直接对准反动政府和地主豪绅，是黔东农民革命的一种原始组织形式。其主要分布于